

政治與體育

——評 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 李 劫

《奧林匹克夢》的兩大主題是「國際化」和「民族主義」，作者視之為一個硬幣的兩面，以此來探討中國的體育和體育界人士在國際上的現身如何影響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奧林匹克夢：中國和體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以下簡稱《奧林匹克夢》，引用只註頁碼)一

書的作者徐國琦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書曾被國際奧林匹克歷史學家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lympic Historians) 評為2008年度最佳書籍。雖然該書出版於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當年，但當時並未引起太大注意。北京奧運會距今五年，正好藉對本書的回味對北京奧運，中國體育、社會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及其未來進行一次反思。

本書的兩大主題是「國際化」和「民族主義」，作者視之為一個硬幣的兩面，以此來探討中國的體育和體育界人士在國際上的現身如何影響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頁3)。本書的構思也別出心裁，它「並非有關中國體育的通史，而是一系列相互間結合和重疊的廣闊專題的敘述」(頁7)。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徐國琦為了寫作此書，曾到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瑞士、美國和加拿大的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查閱了大量資料，而其中的很多檔案，例如藏於美國密歇根大學圖書館的有關中美關係的檔案，渥太華的加拿大

公共檔案館裏的資料，以及北京的中國外交部檔案室的文件，等等，只是最近才對公眾開放(頁4、325-27)。本文將循着全書八章的順序，來對該書進行一個大致的點評和分析。

一 現代體育與現代中國

在《奧林匹克夢》第一章「以尚武精神增強國力」裏，徐國琦認為「體育」(sport or physical education)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其實並不佔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文化不看重個人的身體素質，反而較關心個人的道德修養，這尤其受到在宋朝以後出現的新儒學、科舉制和纏足等的影響(頁14-15)。西方的體育大概在1840年左右(鴉片戰爭後)進入中國，但那時主要的參與者是外國人，並不鼓勵中國人參與，而且大多數中國人也無此興趣(頁25)。在這過程中，教會學校曾對體育在中國的傳播作出過努力。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在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下，首屆中國全國運動會得以舉行。有趣的是，這次運動會的籌辦人員和裁判都是外國人，而運動會的官方語言是英文(頁26)。

1903年，清廷採用了受西方影響很深的日本課程來作為自身現代教育系統的一部分，裏面就包括體育科，並規定所有學校都必須設立體育課(頁27)。1906年，清廷再度出台新措施，要求所有學校的教科書必須提倡國民軍事化和強調尚武精神(頁28)。對於體育在現代中國的源起，作者在第一章的結尾總結如下：

顯然，中國人民緊隨世界潮流，追求尚武精神和軍事化社會。現代體育在中國不僅僅是一項娛樂，中國人民還認為其對國家的未來及在世界的地位至關重要。我們將要看到，中國通過參與西方體育競賽來重揚國家身份的努力是為了達至一個更嚴肅的目標：在世界新秩序的外交層面上挑戰自身的舊制度和現存的國際體系。(頁34)

二 奧運會與中國人

在第二章「通過國際體育來重構中國形象」中，徐國琦敘述了中國首度參加1932年洛杉磯第十屆夏季奧運會的經歷。正如作者所言，當時中華民國的參與是基於「要達至國際化的決心多於對體育的愛」(頁40)。本來國民黨政府拒絕資助中國代表團出征洛杉磯，但是1932年6月12日上海《申報》報導，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也可能參與洛杉磯奧運會，並因此令日本對華入侵有了國際上的合法性，從而促使中國立即作出參賽的決定(頁40-41)。本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的唯一成員劉長春在奧運會開幕前一天抵達洛杉磯，他被當時的奧運官方報告形容為「四億人民的唯一代表」(頁42)。儘管劉長春沒有在他參加的100米和200米跑中進入前六名，但如作者所言，中國的參賽已經達到四個目的：「一、阻止日本人通過奧運會來合法化其滿洲國傀儡政權的陰謀；二、揭開了中國參加奧運會的新時代；三、提升了中國與世界各國運動員的交流；四、讓中國觀

徐國琦敘述了中國首度參加1932年洛杉磯第十屆夏季奧運會的經歷。正如作者所言，當時中華民國的參與是基於「要達至國際化的決心多於對體育的愛」。

體育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成了追求世界革命的手段，毛澤東及其同僚利用體育來為政治和革命服務，通過體育的交流來培養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憑此，中共政權加強了統治合法性和得到了國際聲譽。

察和學習世界體壇的冠軍水平。」(頁42-44)

繼洛杉磯奧運會之後，中國在四年後再度出擊1936年的柏林第十一屆夏季奧運會。這次國民政府給予大力支持：除全程資助一支龐大的代表團外，還派遣了一個總數為四十二人的學習組前往柏林和其他歐洲城市進行觀摩考察(頁45)。國民政府最後一次組織參加奧運會是1948年在倫敦舉行的第十四屆夏季奧運會。當時的中國已經陷入國共內戰，中國代表團不僅再次在獎牌榜上顆粒無收，而且因為財政困窘，不能入住奧運村，最終只能借宿於一所小學內，並自行煮食。比賽結束後，中國代表團甚至要靠借錢才能購買回國機票。不過，正如作者所言，至此中國已經向世人宣示期望通過體育的參與來融入國際社會，這就足夠了(頁48)。

三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體育

徐國琦在第三章「現代中國的體育和民族主義」中寫道：「儘管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是政治對手和擁有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但兩者都意識到體育對國家建設、中國民族主義的表達，以及國際參與的價值。所以在1949年的政治分界線後中國對體育的參與和興趣仍然有驚人的持續。」(頁48)雖然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以來是在國際奧委會的排斥下幾乎與世隔絕地開展體育，但並未放棄通過發展體育來達致國際化的目的。中共

政權有一點不同於國民黨時代，就是體育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成了追求世界革命的手段，毛澤東及其同僚利用體育來為政治和革命服務，而且往往不注重競技體育中的核心——取勝，卻關心通過體育的交流來培養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憑此，中共政權加強了自己在中國統治的合法性和得到了國際聲譽(頁49)。

儘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體育上的立場看似奉行「友誼第一」，但其實有時也會把比賽輸贏無限上綱上線，將其與國家榮辱相聯繫，這種情況在與中國有歷史恩怨的日本較量時尤為突出(頁71-72)。本章最後，徐國琦對毛時代的中國體育有如下的總結：

人們甚至可以認為毛時代中國在體育上為奉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之精神而故意落敗，因為中國人確信自己在體育方面的優越足夠讓其承受任何作為政治用途的比賽結果。從另一方面而言，故意落敗不會令到中國的國家尊嚴受損，相反，其提升了中國的聲譽，因為人們認識到中國代表隊能將勝利拱手相送。(頁73)

四 體育與「兩個中國」

在第四章「兩個中國的問題」之始，徐國琦首先引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創始者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話，即「體育地理」是與「政治地理」完全不同的。顧拜旦期望國與國之間不要把政治和意

識形態上的紛爭帶入競技體育之中。但正如作者指出，這番見解有點天真、樂觀，沒有幾個政府會接納這種理想主義(頁75)。在政治和體育糾纏不清的例子中，中國大陸和台灣則是最有代表性的。

中國大陸和台灣在1949年後一直都用體育來作為支持自己在國際社會上的政治合法性的工具，雙方都各自宣稱代表中國，並極力排斥對方在國際奧委會的大家庭之外。為甚麼「兩個中國」的問題如此棘手？按作者的理解，主要原因有兩點：首先，北京和台北都聲稱自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因此擁有國際奧委會的唯一合法資格，而且都不容忍另一個「造反政府」(rebel government)在國際組織裏佔有一席之地；其次，雙方都認為自己既然是政治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也就當然是體育組織裏的唯一合法代表，完全無視和不去理解國際奧林匹克的精神。國際奧委會在處理此事上的不同標準和無能為力也導致「兩個中國」的問題日益嚴重(頁76)。

「兩個中國」問題得以解決有賴於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的上台及其務實的國策。鄧不僅是一位體育愛好者，而且他希望中國能加快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包括參與奧運會。他親自參與中國與國際奧委會關於中國重返奧運會的談判，其中包括台灣的問題(頁112)。作者認為「兩個中國」問題在國際體壇上的定局反映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理念，雖然很多人熟悉鄧運用此理念來解決香港回歸問題，但卻很少人知道「一國兩制」首先是用來解決在國際奧委會有關台灣問題的爭論。另外，儘管台灣對「兩個中國」

問題的最終解決結果不滿，但作者認為台灣仍能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國際體壇賽事來維繫其合法性，以此抵消它在世界舞台上日益被消噬的影響力，這正是台灣的利益所在(頁114)。

五 乒乓外交

徐國琦在第五章「體育上的乒乓外交」中一開始即引用周恩來在1971年說的話：「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將乒乓球啟動並改變世界。」(頁117)這句話帶出了兩層意思：首先，因為乒乓球是中國的國球，利用乒乓球進行外交是中國的一大發明；其次，乒乓外交在中共歷史上基本是毛澤東一人設計下的產物。

首先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其次因為韓戰，中美兩國在1949年後徹底疏遠，並延續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相互仇視和不信任。1970年代初，中美兩國的領袖——毛澤東和尼克遜(Richard M. Nixon)都是體育愛好者，當毛突然提出兩國進行乒乓球友誼賽的設想時，尼克遜非常樂意接受，並深刻理解其中的意義。當時文革正在全國肆虐，中國幾乎停止了所有重大國際賽事的參與，但中國仍是少數國際體育項目(乒乓球就是其中之一)協會的會員，所以當1971年3至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時，中國絕不放過此次機會來達成其政治目標(頁126-27)。

歷史性的一刻出現在1971年4月4日，當時美國乒乓球隊隊員科恩(Glenn Cowan)令人意外地出現在中國隊的巴士上，並與中國隊

作者認為雖然很多人熟悉鄧小平運用「一國兩制」的理念來解決香港回歸問題，但卻很少人知道「一國兩制」首先是用來解決在國際奧委會有關台灣問題的爭論。

尼克遜在1972年2月21日到訪北京是一個歷史性時刻，毛澤東清楚地向尼克遜表明正是乒乓外交令雙方接近。乒乓外交不僅帶來中美雙邊關係之突破，更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內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員莊則棟交換禮物(頁132)。經過多番周折，毛澤東在4月7日(世界乒乓球賽的最後一天)透過其私人助理通知外交部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還答應承擔他們訪華的全部費用，最終其十五名成員在4月10至17日到訪中國，這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度在官方批准下有美國訪問團來華(頁134-35)。美國方面對此的反應也非常積極。4月14日，尼克遜宣布多項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改變，包括中止長達二十年的對華貿易制裁和準備加速發放中國公民的訪美簽證。4月21日，在白宮會見完訪華歸來的美國乒乓球隊後，尼克遜授命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其他人士研究拓展中美外交關係的可能性。而尼克遜在1972年2月21日到訪北京，更是一個歷史性時刻，期間毛澤東清楚地向尼克遜表明正是乒乓外交令雙方接近。乒乓外交不僅帶來中美雙邊關係之突破，更在1971年10月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內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頁144-48)。

六 加拿大的尷尬

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辦的第二十一屆夏季奧運會，除了其費用遠遠超出預算外，表面看來風平浪靜，但在本書第六章「蒙特利爾奧運會：政治挑戰奧林匹克理想」中，徐國琦記述了當年以特魯多(Pierre Trudeau)為總理的加拿大政府置國際奧委會的條文不顧，為了遷就並非國際奧委會成員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而把屬於國際奧委會成員的台灣拒之門外。按照作者的引述，最大的原因並非加拿大對共產主義政權表示同情，而是基於經貿利益的考量：加拿大當時正面臨着經濟蕭條和高通脹，它在1975年與台灣有1.44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有高達3.2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加拿大政府在權衡利弊後，不得不依從自身經濟利益作出選擇(頁167)。

加拿大政府的立場是，它只承認一個中國，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加拿大歡迎台灣參賽，但不能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義。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並不認同這種觀點，1976年5月，當國際奧委會得知加拿大政府的立場後，即指責其「完全與奧林匹克的規則相衝突，並違背了當初允許蒙特利爾承辦奧運會的先決條件」(頁173)。加拿大政府的決定不僅令加拿大國內人士感到憤怒，也招致其盟友和鄰國——美國的批評。除了美國奧委會和多名議員的嚴正抗議外，加拿大駐華盛頓大使館更是遺憾地指出，對於美國公眾而言，加拿大政府已經是一個「原罪深重者」(頁182)。

但徐國琦對這一事件的分析卻令人回味：這次紛爭的最大受害者是台灣，而兩個最大得益者則是中共和美國。首先，1976年是美國獨立二百周年和大選年，當時美國的兩位總統候選人卡特(James E. Carter)和列根(Ronald W. Reagan)都將這次加拿大事件作為競選話題，撈取各自的政治資本(頁185)。其次，雖然華盛頓強烈譴責加拿大否決台灣的立場，但它也有所收

敏，注意不去惹怒北京(頁190)。這對於美國而言可謂一箭雙雕：既在表面上維護了奧林匹克精神，也保住了自1972年以來剛建立的與中共的關係。最後，作者認為儘管北京並沒有就此事表態，但蒙特利爾奧運會事件的最大贏家就是中共：通過事件，中共在其能否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問題上取得了足夠的話語權(頁194)。

七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體育

第七章「中國醒來：後毛澤東時代」全面記載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體育發展。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體育追求的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話，那麼在鄧小平主政後中國強調的目標正好相反，「金牌效應」是全國上下所追求的。1980年，國家體委再提出一個新目標：「衝出亞洲，走向世界」，這亦成為中國體育的戰鬥口號，象徵着改革開放後更有自信的中國之崛起而成為世界經濟一股新興力量(頁197)。

北京政府抓住了1984年洛杉磯第二十三屆夏季奧運會的機會。正是在與1932年奧運會同一個舉辦地，中國在五十二年後捲土重來。又因為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對此屆奧運的杯葛，中國代表團空前贏得多面金牌，令全球為之震驚。但此時中國的對外體育交往並非一片晴天。1982年，中國女網球手胡娜趁在美國比賽時叛逃並隨之尋求政治庇護，美方在1983年更不顧鄧小平的警告給予胡政治難民的身

份。此事激怒了北京，其隨之宣布將取消當年全部中美雙邊的文化和體育交流，包括中國參與洛杉磯奧運會之前的熱身項目(頁198-99)。

踏入新世紀，籃球運動員姚明的例子更能展示後毛時代中國如何通過體育融入國際社會。姚明是第二位到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BA)打球的中國選手，他在2002年加盟休斯頓火箭隊(Houston Rockets)後的表現，不僅為中國運動員和國民帶來信心，其也成為西方媒體的寵兒，令美國人民愈來愈關注中國，並為中國和美國雙方都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頁209-11)。

八 北京奧運和中國政治轉型

徐國琦在本書的第八章「北京2008」詳細論述和分析了2008年第二十九屆北京夏季奧運會的來龍去脈，但其中最讓人感興趣的是關於北京奧運和未來中國政治轉型的問題。作者在本章先追述此前北京在申辦2000年奧運的歷程，當北京的申請落敗給澳洲雪梨時，很多中國人都認為這是美國在反對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化，以及是西方圖謀遏制中國計劃的一部分，中國的城市青年和知識份子更感覺西方社會將中國視為三流國家和處心積慮地要把中國擋於世界舞台之外(頁238)。

但中國在1998年捲土重來，正式向國際奧委會提交了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意向書，還提出了「新北京，新奧運」(New Beijing, New Olympics)、「人文奧運」(People's and Cultural Olympics)等作為申辦

由於奧運會的舉辦，北京短暫地放鬆了對境外傳媒的限制。但這些變化只是從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0月17日有效，部分敏感地區如新疆和西藏仍然不能對外國媒體自由開放。北京奧運的成功舉辦對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

中國體育正在經歷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去中央集權化的管理模式，而且因為很多外籍教練和專家到中國執教所帶來的文化和思維的轉變，中國體育在未來可能有翻天覆地的轉變。

口號，用以洗刷過去在國際上的負面形象，並最終在2001年贏得了歷史性的主辦權(頁242-44)。由於奧運會的舉辦，在比賽期間，北京短暫地放鬆了對境外傳媒(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的限制。在新措施下，外國記者不僅可以相對自由地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採訪，而且可以僱用中國籍工作人員，但這些變化只是從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0月17日有效。當然，奧運期間中國的部分敏感地區，例如新疆和西藏，仍然不能對外國媒體自由開放(頁249-50)。簡而言之，北京奧運的成功舉辦對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

九 結論和分析

儘管由國家全權控制的體育發展模式仍然盛行於今天的中國，但徐國琦也在書中透露了近年來一些出人意料的變化。2007年4月，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派隊參加美國杯(America's Cup)帆船賽，令人感興趣的並非是這支中國隊伍能否在比賽中獲勝，而是這支隊伍的贊助商並非中國國家體委，而是一家私人機構，整支隊伍由一位法國教練帶領，隊員基本上為法國人。作者由此預言：「當更多的中國或國際企業贊助、擁有或資助體育隊伍或賽事時，就能在中國營造一類與目前由國家控制的完全不同的體育模式。這種趨勢看來只會愈來愈強，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從長遠而言，體育在中國的發展就會促進急劇和長久的政治轉變。」(頁264)

此外，上面的例子也顯示中國體育正在經歷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去中央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管理模式，而且因為很多外籍教練和專家到中國執教所帶來的文化和思維的轉變，中國體育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有翻天覆地的轉變。有一點需要指出，如果中國體育在未來不再由國家統一操控，每個比賽項目各自獨立，各自尋找其贊助商，自行組織和管理，那麼將可能轉化為由多個非政府組織帶領體育隊伍到國外參賽和交流，從而為中國未來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模式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不過從另一方面而言，儘管中國體育有着以上種種的可能性，但一些現實的限制有可能令到作者關於透過中國體育的興盛來促使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的論述為時尚早：

第一，體育雖然是極受中國大眾歡迎的活動，但並不是一個關乎民生的要害問題，中國人民似乎更關心教育、住房、醫療等問題。體育對於老百姓而言充其量只是一項娛樂。雖然有時候體育比賽的輸贏會引發群體性的動亂，但其實只是人們藉此發洩對現實的不滿。有一點需要注意，作者在書中也引用了很多當代中國因體育而導致的失控場面和腐敗問題(尤其足球方面)的例子，原因多在於中國國民素質欠佳和現時體育制度的缺陷(頁220-24)。這種過激行為只會產生暴力和「憤青文化」，對中國社會並無良性的促進作用。

第二，中國體育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仍然只是少數人才有資格參與的精英體育。作者在本書開頭寫道：

本書基本上集中於中國的精英社會。實際上，中國社會自1895年至今一直是處在精英階層的控制之中，從而這些精英扮演着爭辯和闡明現代中國的國民身份和國際化的領導者角色。體育活動發展到國家階層，尤其自1949年後，更只是限於精英人士的參與，被國家所控制和管理，而且時常受到來自政治上的干擾。(頁7-8)

應該承認，直到今天，中國體育仍限於人文環境和其他因素，例如人多地方少導致的場地不足、人們收入仍然普遍過低以致無法提升體育方面的消費、生活和工作環境的日益嚴酷磨滅國民對體育的興趣，等等。

在這種脫離群眾基礎的情況下，中國體育仍然必須依賴政府才能生存。所以毫不奇怪，按作者的引述，中國年青一代的體質狀況自1985年以來不斷下降，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把主要資金放在培育奪取金牌的運動員身上，而忽視了大眾的健康(頁269)。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的事實證明，中國體育的空前成功仍然是精英體育的勝利和舉國體制的結果，正如作者所言：「一個過份迷戀於金牌的國家不是一個自信的國家。一個需要金牌去推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建立合法性的政府不是一個自信政府。一個不能得體地接受體育競技中的失敗的民族不是一個從容自若和有安全感的民族。」(頁268)另外，作者又對中共政權及其統治下的體育發展作了如下的總結：「一黨專政下的共產黨可能希望其國民在體格上強壯，但

它不鼓勵其國民擁有自由和健康的思想。一個有活力和強大的國家同時需要身體健康和思想自由的國民。」(頁269)

其實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通過體育，外部世界文化和各種價值觀不斷對中國發揮影響。例如為了準備北京奧運會，中國不僅聘請世界著名建築師來設計運動場館，而且更僱用一大批外籍教練來培訓各個項目的奧運代表隊，作者更引用國家體育總局官方刊物《中國體育》裏的一文稱此現象為「新洋務運動」(頁213-14)。可以這樣說，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體育在中國的發源純粹是西方的舶來品，這種文化和概念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是全新和陌生的。經過一個多世紀，今天體育在全球扮演着維繫世界和平，增進各地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的作用。中華民國通過體育令其不被國際社會孤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通過體育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通過體育，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樹立了抗日救亡的信心，增強了國力，找到了國民的身份，並通過體育的交流融入了世界大家庭。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世上數一數二的體育大國，「東亞病夫」的標籤已一去不復返。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體育一定能繼續去改變中國，最終為世界呈現一個更國際化和多元化的中華民族，而這也正是徐國琦寫作本書的願望。

李 劼 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
研究生

中國體育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仍然只是少數人才有資格參與的精英體育。在這種脫離群眾基礎的情況下，中國體育仍然必須依賴政府才能生存。2008年後中國體育的空前成功仍然是精英體育的勝利和舉國體制的結果。